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推荐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青年出版人
学术丛书

孙毕◎著

章太炎《新方言》研究

主编◎孙颢 副主编◎曹培章 总策划◎吴士余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推荐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孙毕◎著

上海青年出版人学术丛书

章太炎《新方言》研究

主编◎孙颢 副主编◎曹培章 总策划◎吴士余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太炎《新方言》研究/孙毕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0

ISBN 7-5617-4792-6

I. 章... II. 孙... III. 汉语方言-方言研究 IV. 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2564 号

章太炎《新方言》研究

著 者 孙 毕
文字编辑 黄曙辉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6
字 数 491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
印 数 3100
书 号 ISBN 7-5617-4792-6/H·300
定 价 39.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本书简介

章太炎《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学史、汉语语源学史以及中国语言学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学界多关注章氏的《国故论衡》、《文始》,而对《新方言》的评价一般是印象性、概括性的,缺乏对《新方言》具体而系统的专门研究。本书以章太炎《新方言》为研究对象,考察它在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成就与局限,并探讨现代语言文字学的相关问题。

我们从《新方言》中切分出1466个今语词(同词异字计为一个词),216组同词异字,以穷尽性调查为手段占有了大量的材料,这更是以前的研究未做过的,具有独创性。我们从传统汉语方言学、现代语言学、海外汉语研究三个角度来考察《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学史上的地位,因此本书研究的角度全面而新颖。

本书将《新方言》和以《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为主的各种方言文献对比,统计并分类考察了《新方言》中未被《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的词语或词语的义项,被《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但仅有《新方言》作为孤证的词语,和《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音义皆同但不以《新方言》为书证的词语,考察了《新方言》中今方言词语的同词异字,并订正了《汉语大字典》、《汉语方言大词典》一些立目、释义、书证方面的讹误,举例说明《新方言》考本字、同词异字研究对《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等方言文献用字的参考作用,因此本书在《新方言》的进一步研究和《汉语大字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修订等方面具有实用价值。

本书预期的目标是,对《新方言》的今通语与今方言词汇作出统计分析以评价它在方言词汇研究方面的成就;对它的词源考证的内容和方法进行分析以见它在语源学方面的贡献;对它的词汇比较进行分析以见它对汉语词汇系统性特点的揭示以及它对现代语言学的启发;整理并分析它语音描写与比较的术语、方法与内容,以见以它为代表的传统方言学在语音记录与研究方面的成就与局限;对《新方言》中今方言词的同词异字全面统计与分析,以进一步考察它在方言词汇调查方面的成就并给汉语方言词典的编纂提供材料和方法论方面的参考;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与成果考察

《新方言》求本字的方法、成就与局限;最后,从传统方言学、现代语言学、海外汉语研究三个角度来考察《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学史上的地位,并给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本书基本达到了这些目标。

本书在如下几个方面开创和深化了对《新方言》的研究,以具体、全面、深入地评价《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学史、汉语语源学史、中国语言学史上的贡献与局限:

1. 第一次对《新方言》的今语词汇进行穷尽性分析与考察,以全面、具体地考察它在方言词汇调查方面的成就。《新方言》中今语词(包括今方言与今通语,不包括民族语)计1466个(同词异字计为一个词),其中今方言词语(有明确今方言地点的词语)770个,今语、今通语、通语词(《新方言》中原有术语)计685个,方言兼通语词11个。此外,少数民族语词3个。古、今语词(包括古语、今通语及今方言词,其中兼为古语、今通语或今方言词者只计为一个词)共计2470个。《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作第一书证(首证)的有221例。按方言系属来统计,《新方言》中今方言词除“南方”语词7个、“北方”(和“南方”皆为《新方言》中原有术语)语词14个之外,其他系属计15种,词语770个。按地名统计,《新方言》描述今方言词的地名有5类计167个,共出现1303次,其中古国名族名、少数民族名、外国名有10个,共出现162次;其余皆为今方言地名。所以《新方言》方言调查范围无论从地域还是从方言系属来看,都几乎遍及全国。

从相关文献来看,《新方言》对汉语方言研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们抽样统计《新方言》28%的材料,涉及的方言文献已达147种。各地方志与《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同一词目下作书证者达284次,而这些文献大多数皆在《新方言》后并受它影响。

在评价《新方言》的方言词汇调查成就时,我们证实了《新方言》对三类共130个方言词的描写的正确性:

第一类是《新方言》中未被《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的词语或词语的义项,共计173个。本书第二章考察了其中的35个,其中27个词语或词语的义项得到了印证;加上第四章《〈新方言〉的同词异字研究》24个被印证的词语或词语的义项,共51个未被《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的词语或词语的义项的正确性得到了证明。第二类词是《新方言》的词语的音义与《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词语音义相同或相通但《新方言》未被《汉语方言大词典》作为书证者,共计25个。第三类词是《新方言》中虽被收录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但仅为孤证的词语,共计329个,本书第二章考察了其中的13个,第四章《〈新方言〉的同词异字研究》考察了41个,这样,共计54个孤证的正确性得到了印证。

本书简介

2. 结合《新方言·自序》和正文中的材料,本书第一次对《新方言》推词源、求本字六例所反映的语言文字规律以及章氏在汉语语源学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考察。

3. 第一次探索了《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学“大三角”比较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并考察了《新方言》对汉语词汇系统性特征的揭示。《新方言》在“殊名”命题中,将古汉语、今方言与今通语三种材料广泛比较,揭示了汉语词汇的系统性、丰富性和统一性的特点,并揭示了词义扩大、词义缩小、词义转移、词义引申等几方面的词义演变规律。本文还对“殊名”——“通词”与“别词”——“恒言”与“殊语”——“通语”与“别语”——“共名”与“别名”几组术语的含义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4. 第一次分析了《新方言》中使用频繁的譬况术语,并进一步探讨传统方言学在记录与分析语音方面的成就与局限。这些音韵术语在《新方言》中与它们通常的含义有所区别,在《新方言》中它们的含义也不尽一致。本书分析了其中六组譬况术语:(一)“开”、“开口”、“开口呼”;(二)“合口”;(三)“敛”、“弇”、“侈”;(四)“收音”;(五)“笼口上气呼之”;(六)“A音(声)在B、C之间”。

5. 考虑到异形词的研究现状并尊重《新方言》原意,本书暂且将《新方言》认为是记录同一个今方言词的各书写形式称作“同词异字”,然后在《新方言》的今方言词同词异字进行穷尽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从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字学两个角度考察了《新方言》中的同词异字产生的原因、分类的标准,并考察了总共216组同词异字,发现有24组和《汉语方言大词典》漏收的词语有关,41组和《汉语方言大词典》中的孤证有关,17组和汉语通用口语词有关。本书以《新方言》为例,探讨了方言词的同词异字研究在方言文献的评价、通用口语词的研究、方言词典的编纂、语言文字的规范等方面的作用。

6. 第一次以具体的材料,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和材料考察了《新方言》求本字的方法、成就与局限,并特别指出,《新方言》用系源、推源的方法求本字本义、解释文献中的疑难语词是《新方言》的特色之一。

7. 在传统汉语方言学领域内,我们选取了《续方言》、《蕲春语》、《昭通方言疏证》与《新方言》作比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新方言》在传统汉语方言学领域内的地位与影响。在现代方言学领域内,我们将《钟祥方言记》、《临川音系》与《新方言》具体对比,以见《新方言》的不足及其对现代语言学的启发。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欧洲方言学达到全盛时期,我们从其中选取了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与《新方言》比较,以从同时代世界语言研究比较的角度,分析《新方言》和西方方言学的异同及各自的成就与局限,并讨论现代语言学的相关问题。

序

吴金华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著,是孙毕博士在复旦大学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记得孙君离开复旦到出版界工作的前夕,问我对他有什么期望。我说,作为汉语史的教研工作者,最大的期望就是他的《章太炎〈新方言〉研究》能在近期内修订出版;因为今天的《新方言》研究,既是章太炎研究乃至近代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又是新世纪汉语史研究中极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去年年底,孙君向我通报了《研究》入选“上海青年出版人学术丛书”的消息,并希望我作一篇序言,我当然非常高兴。今年适逢章太炎《新方言》开笔一百周年,为了表达心中对先哲的纪念,也表示自己对同学的支持,我觉得应该就章太炎的《新方言》及孙君的《研究》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

20 世纪之初,既敢于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掀天揭地,又能够在语言文字研究上继往开来的中华英杰,首推章太炎。章太炎的《新方言》着笔于 1906 年旅日期间,1907 至 1908 年连载于《国粹学报》。此前,太炎因 1903 年发表向整个封建社会宣战的革命檄文《序〈革命军〉》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被腐败透顶的清政府逮捕入狱。1906 年出狱后,他一面继续发表鼓吹革命的政论,一面本着提倡国粹的宗旨从事学术研究。当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派人迎接他到日本的时候,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那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显而易见,章氏所谓国粹,指的是富有民族精神的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提

倡国粹,为的是提高自尊自信的民族意识,激发爱国报国的革命热情。《新方言》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发表的。今天,我们在新世纪之初研究章太炎的《新方言》,当然不能不关注这样一点:这是一部在思想史、文化史上闪耀着时代光辉的学术著作。

《新方言》作为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史上也有一个非常耀眼的特点,那就是对清代学术研究的突破。这个突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摆脱清代方言研究的局限。了解清代学术史的人都知道,清代的“小学”,也就是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涌现出段玉裁、王念孙等一批学术大师,推出了不少辉煌夺目的科研成果;但是,方言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虽然是属于小学的别开生面之作,钱绎的《方言笺疏》虽然用力甚勤,但胡、钱的成绩和影响跟段氏的《说文解字注》、王氏的《广雅疏证》等远远不能相比。此外,有的学者从续补古书的角度对扬雄的《方言》加以增广,如杭世骏的《续方言》;有的学者则侧重于从印证古书词语的角度采辑方言熟语,如翟灏的《通俗编》。但是在章太炎看来,无论是续旧还是证古,都折射出作者的观念没有突破“小学之用,趣于道古而止”的局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章氏主张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研究鲜活的方言,试图在广泛搜集方言词语的基础上,根据语音的历史演变规律来阐释词语的古今演变现象,既注意方言与通语的共时比较,又努力考察其历时变化,既以古证今,又以今通古,而不是一味地“道古”。《新方言》就是实践这种主张的产物。第二,从西方的语言学研究汲取营养。当时,学习西方语言的人已经注意到通过“寻其语根”的方法更好地理解 and 掌握西语的特点;而国语语根的研究,也就是汉语语源学的研究,在国内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章氏觉得这样的现状亟须改变,因此在《〈新方言〉序》里说:“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在这种背景下,《新方言》着重从语源学的角度研究方言,考本字,求语根,意在使人们看到汉语的古语今词并非一盘散沙,它也像欧罗巴语一样有条理可寻。总而言之,在上述背景映衬下,引人瞩目的《新方言》之“新”,无疑是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这种更新,使长期处于经学附庸地位或未能摆脱续旧证古局限的小学,跃进为具有独立精神的汉语言文字学;使当时的国语研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迈出了新的一步。大约正因为《新方言》富有鲜明的独创性,章太炎在1907年发表的《汉字统一会之荒陋》一文中谈到《新方言》时说:“文理密察,知言之选,自谓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矣!自子云之后,未有如余者也。”在这里,章氏以方言研究史上的开山大师扬子云自许,足见其自我评价之高。

章太炎对《新方言》之所以如此爱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此书体现了他

创新务实的学术理念。他在1907年《再与人论国学书》里说：“学名国粹，当精研覃思，钩发沈伏，字字徵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若徒摭旧语，或张大其说以自文，盈辞满幅，又何贵哉？实事求是之学，虑非临时卒办，即吾作《新方言》，亦尚费岁余考索。昔子云把弱翰，齑油素以问卫卒，孝廉，归乃槩次异语，二十七岁始有成书。吾比之子云，已过速矣。若乃钞撮成言，加以论议，万言之文，警欬可了，然欲提倡国粹，不应尔也。”这就是说，国粹之学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写出有创见、有实证的文章，不应当搞那种“钞撮成言”、“警欬可了”的速成之作；而《新方言》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虽然远远不及扬雄《方言》，但毕竟是“精研覃思，钩发沈伏”的结果。所谓“不蹈空言”、“不因成说”，实际上也是《新方言》的写照。

《新方言》全书十一卷，共八百多条。此书问世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续补及仿效之作络绎不绝。其续补之作有陈启彤的《广新方言》、方勇的《续新方言》、高景成的《新方言补》等，受《新方言》的影响而撰述的同类论著有黄侃的《蕲春语》、汪东的《吴语》、姜亮夫的《昭通方言疏证》、徐复的《方言溯源》等，这一系列论著为近现代的方言研究建树了富有章学特色的丰碑。所谓“章学特色”，用章太炎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仅强调“求是”，还特别注重“致用”。《新方言》及其同类著作的应用价值也很显著，1986—1993年陆续出版的《汉语大词典》、1999年出版的《汉语方言大词典》都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

3

基于上述认识，我觉得孙君在“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着重从汉语史的角度研究《新方言》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二)

在汉语史研究领域，关于《新方言》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迄今尚未达成共识。由于绝大多数评议者并没有对原著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深入研究，说话的依据只是在泛读或选读《新方言》过程中留下的总体感受或局部印象，所以以往的一切评议都有重新验证的必要。

以往的评议，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高度赞扬，充分肯定。二，严厉批评，全盘否定。三，褒贬参半，基本肯定。

第一类评议认为，章太炎的语言文字研究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新方言》代表了当时方言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汇集汉语方言词汇并探求其本字和语源，发前人所未发，创获很多。例如黄侃在《〈新方言〉后序》中说：“已陈之语，绝而复苏；难谕之词，视而可识。”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引录了黄说，并认为“这正恰如其

分地指明了《新方言》的精粹所在。”1999年出版的《章太炎全集》第七册收录了蒋礼鸿校点的《新方言》，蒋氏在《校点说明》中阐发《新方言》的政治意义时指出：“本书是作者在日本所著，书成于‘周、召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九年’，即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辛亥革命的前三年。著书的宗旨是‘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刘师培《后序》语），具有深厚的民族意识，仅从自序用‘共和’纪年就可以看出。”在述评《新方言》的内容时，蒋氏认为：“《新方言》是继汉扬雄《方言》而著的方言学著作。其所以为‘新’，因为《方言》仅仅汇集载籍所有及调查所得的古今异语和别国方言，《新方言》则据今之方言俗语上推其根源……《新方言》不仅为记录方言之书，而且是就今语依据声韵转变的条理以考察语源的语源学著作。”由此可见，在熟悉章太炎著作的校点者眼中，《新方言》拥有前所未见的思想史、学术史价值。

第二类评议认为，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不是前进而是倒退的，其研究成果只有负面价值。例如傅斯年1928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梅祖麟在2002年《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中引了傅氏之说，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

第三类评议认为，《新方言》有很大的成就，但也有值得注意的缺陷。例如沈兼士在1923年发表的《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中说：“综其长处，约有两点：（1）章氏以为今言与古语，其质本同。今世笔札常文所不能悉的说话，只是声音有流变耳，倘以古今声韵通转之定律推之，皆可于《尔雅》、《说文》之中得其本字，较之扬雄《方言》但列同训而不辨本字者为彻底，其他诸家更无论矣。（2）章氏以为小学不但可以考古，亦可以通俗致用。向来只用于考证死文字，现在却拿来整理活语言。经学附庸的小学，一跃而为一种有独立精神之语言文字学，这是文字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关键。乾嘉时代的学者所以不及他者，正就在这一点。有了这一部著作，然后文字学的效用才能全而不偏，而于方言学可以算得是有起衰继绝之功。”与此同时，沈氏又指出《新方言》在“求本字”方面有六个缺点。又如王力1947年发表的《新训诂学》，一方面肯定《新方言》在“字族”研究上有开辟新路之功，一方面谈到它的缺陷：“《新方言》的方法更为危险。现代离开先秦2000余年，离开汉代也近2000年，这2000年来中国的语言不知经过了多少变化。《新方言》的作者及其同派的学者抱着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现代方言里每一个字都可以从汉以前的古书尤其是《说文》里找出

来,而不知有两种情形是超出古书范围以外的。第一,古代方言里有些字,因为只行于一个小地域,很可能不见于经籍的记载。而那个小地域到后来可能成为大都市,那些被人遗弃了的字渐渐占了优势。第二,中国民族复杂,古代尤甚,有些语汇是借用非汉族的,借用的时代有远有近,我们若认为现在方言中每字都是古字的遗留,有时候就等于指鹿为马。”

鉴于以上三类说法分歧甚大,而且所有的说法又都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有的说法甚至空骋思辨而毫无实证,于是孙君的《章太炎〈新方言〉研究》就采用思辨与实证并重的研究方法。他在《研究》中说:“评价任何历史文献,如果不经深入考察就横加批评或一味地赞扬,就如同将语言规律绝对化一样,都是不科学的;同样重要的是,考察历史文献,要注意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着重考察其历史贡献和时代局限,不能以今律古,苛求古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以共时及历时的比较研究为思辨的支点,以对原著的全面考察及对大型辞书中有关内容的穷尽性调查为实证的基础。通过研究,孙君的发现是:《新方言》取得了传统汉语方言学的最高成就,它不仅对后来的传统汉语方言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现代汉语方言学也有启发意义。如果跟同时代西方学者的汉语方言学比较,可以看出中外学者虽然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走了不同的路,但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各有其特色,两者长短互见。相对于现代汉语方言学而言,《新方言》确实存在不足之处,这也是无须讳言的历史局限。所以,他在《研究》中总结自己的体会时写道:“通过《新方言》与其同时代的西方语言学著作相比,可知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但是也必须提醒自己不能夜郎自大。”

我认为,孙君的思路和方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现代科研精神,《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其可信度较高于前人是可以断言的,作者由此发生的感悟也有积极意义。

(三)

读了孙君的《研究》,印象最深的是如下四点。

一、研究《新方言》,首先必须对章太炎及章氏语言文字之学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例如1927—1928年间,章太炎对国民党当局十分不满,1927年6月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呈请中央通缉著名“学阀”,“学阀”的名单将章太炎列为第一;1928年6月章太炎在上海公然抨击国民党“不是以党义治国,乃是以党员治国”,又遭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呈请通缉。这时的章太炎,已成了政府及其追随者极其痛恨的对象。如果不了解章太炎的这段经历,就不容易理解傅斯年为什么在狠批

《新方言》时以谩骂的语言痛斥“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又如,着力于语源学的研究,是章太炎的《新方言》、《文始》等系列著作中的一大特点,也是超越以往方言著作的一大亮点,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就有可能像傅斯年那样说出“倒退过二千多年”之类的话来。孙君有鉴于此,在研究《新方言》的过程中对章氏之学用力甚勤,进而注意从宏观上对章学、汉语方言学、中国语言学史及《新方言》研究现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这是值得称道的。

二、现代的科技经验提醒我们:只有在宏观背景下展开微观的研究,只有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才有可能突破以往概况性的、印象性的研究水平。孙君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对《新方言》的材料做了穷尽性的分析,归纳出一系列数据,如《新方言》所论及的古今语词共有 2470 个,同词异字共有 216 组,167 个地名共出现 1303 次,等等。正因为这种系统的、穷尽性考察是前人不曾做过的基础工作,因而《研究》的独创性颇为显眼:它首次对《新方言》中的古今语词做了总体描述,首次评价了《新方言》在方言词汇调查方面的成就;首次探索了《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学比较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并探讨了它在“殊名”等一系列命题中对汉语词汇的系统性的揭示;首次分析了《新方言》使用频繁的六组譬况术语,并进一步探讨传统方言学记录与分析语音的成就与局限;首次以具体的材料,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考察《新方言》求本字的方法、成就与局限,并特别指出,《新方言》用系源、推源的方法求本字本义、解释文献中的疑难词语是《新方言》的特色之一。

三、《研究》从传统汉语方言学、现代汉语方言学、海外汉语研究三个角度考察了《新方言》的学术特点、历史贡献与时代局限。在传统汉语方言学领域内,作者将《续方言》、《蕲春语》、《昭通方言疏证》与《新方言》作比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新方言》在传统汉语方言学领域内的地位与影响;在现代汉语方言学领域内,作者将《钟祥方言记》、《临川音系》与《新方言》具体对比,以见《新方言》的不足及其对现代语言学的启发;在海外汉语研究方面,作者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与《新方言》比较,从同时代世界语言研究比较的角度分析《新方言》和西方方言学的异同及各自的成就与局限。这样的研究,本身就充满了新意,毋庸置疑,作者已经把《新方言》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四、《研究》兼顾课题的理论探讨与实际运用价值。孙君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曾发表过《从方言词的同词异字现象看章太炎〈新方言〉的成就》、《〈汉语方言大词典〉商榷》、《论章太炎〈新方言〉的古组观》、《论章太炎〈新方言〉的吴语比较研究》等文,这一系列论文着重阐发了《新方言》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研究》一书进而指出《新方言》的现实意义:章氏研究汉语方言有四个制高点,即对全国

汉语方言系统的把握;对上古音的系统的、独到的研究;对以《说文》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文字学的精深研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熟练掌握。这种居高临下、厚积薄发的治学方法,至今仍然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者应当借鉴的。而《新方言》在传统语言文字学,特别是在语音描写与分析、方言的调查方面的缺点则提醒我们,应该时刻注意吸收外国语言学、现代语言学的营养,否则中国传统学术就会故步自封,难以发展。此外,《研究》内容丰富,征引广博,其中的资料对今后《新方言》的进一步研究及《汉语大字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的修订工作均有利用价值;该论文第四章“《新方言》的同词异字研究”对方言文献的评价、通用口语词的研究、方言词典的编纂、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也有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我以为《研究》是一部比较扎实的富有创意的汉语史研究成果。作者从汉语方言研究史、汉语语源学史、中国语言学史的角度评议《新方言》的历史贡献与时代局限,在《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独到见解。《研究》的见解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它不是泛泛而谈,也不是凭空高论,更不是无知妄说;因为它的各章结论都是在努力地进行系统调查与比较研究之后形成的。你可以不同意《研究》的观点,但不能无视那些支持其观点的实证,那些实证是作者从好几年的认真调查研究中获得的。

末了,我还想对《研究》的作者提一点新的希望。《研究》的出版,虽然意味着作者对《新方言》历时数年的系统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可喜的结果,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头;即使就《研究》各章节的专题深入下去或拓展开来,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说不定还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结论。此外,《新方言》是用文言文写的,书中征引的内容大多是古奥难懂的文献,即使是比较熟悉中国古文献的读者,读起来也相当吃力;有的学者之所以在评议《新方言》时发生误解原著的现象,也正是因为此书实在不容易读懂,所以我还希望孙君能在今后的将来搞出一本《新方言校注》,为今后的读者尽可能减少一些研读的障碍,增添一些利用的方便。不知孙君以为如何?

2006年9月撰于复旦大学古籍所

序 二

金文明

这是一部汉语方言研究史方面的学术著作。作者以章太炎《新方言》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章太炎(1869—1936)是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和国学大师。章氏在国学研究上影响最大的就是《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等一系列语言文字学著作。近几十年来,关于章太炎语言文字学著作的述评虽然不绝于世,但是,对上述著作进行深入研究的大型成果至今还没有出现。现在,“上海青年出版人学术丛书”推出了孙毕同志的《章太炎〈新方言〉研究》,我作为此书的评议人和推荐人之一,感到非常高兴。

众所周知,章太炎《新方言》在汉语方言研究史、汉语语源学史以及中国语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新方言》在方言词汇研究方面有哪些成就与不足,《新方言》在语源学研究上有哪些贡献与局限,《新方言》的研究方法有什么特点,《新方言》在今天还有哪些应用价值,等等,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认真探讨和阐述在过去的汉语史论著中不是处于空白状态,就是只有零星的片断的反映。《章太炎〈新方言〉研究》的作者为了推进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试图从传统方言学、现代语言学、海外汉语研究三个角度来考察《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学史上的地位,这种研究无疑是值得肯定和支持的。

就我所见,此书至少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作者能用现代语言文字学研究的理论和眼光,对《新方言》做大规模、多角度、有系统的研究;二是作者对《新方言》的评议,是在力求穷尽性地考察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展开的;三是作者努力运用历时比较和共时比较的方法,评议《新方言》的历史贡献与时代局限。我想,一个青年学者既有现代的研究眼光,又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并能运用科学的方法去从事研究,其研究的结果无论如何都是值得重视的。

作者年富力强,聪明好学,我相信,只要继续努力,一定会取得更可观的成绩。

2006年3月

前 言

章太炎是清末杰出的国学大师,以他为代表的章黄学派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章氏不仅首次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提出“语言文字学”的概念,还亲自从事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实践。他所撰《新方言》、《国故论衡》、《文始》、《小学答问》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他所著的《新方言》不仅在方言学史上,而且在汉语语源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方言》问世以后不久,就有不少传统汉语方言学著作或用其研究之法,或仿其体例,或直接采用其材料,或吸收其语言学思想与观点。《新方言》在当时就有重要影响,有人誉之为传统汉语方言学的高峰,代表了当时方言研究的主流。《新方言》问世至今虽已百年,但其影响力依然不减。有些学者从现代语言学出发批评其研究方法,或直接指出它的材料方面的一些错误;有些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肯定它抢救历史方言资料、推进传统汉语方言研究的贡献;也有人虽然批评其材料中的某些失误,但是肯定其研究方法思路;更有各种方言文献特别是大型解释性辞书或明或暗引用《新方言》的材料。这一切都说明,时至今日,《新方言》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

但是我们遗憾地发现,与《新方言》的巨大影响和重要地位形成对比的是,迄今为止缺乏对《新方言》具体、系统的专门研究。虽然许多语言学家都评价过《新方言》,但这些评价都不是建立在对《新方言》及《新方言》相关材料的穷尽性考察的基础上的,因此所做的评价大多是片断性的、印象性的,甚至是盲目性的。这当然不是科学的研究,这不仅不能对《新方言》、章黄学派乃至中国语言学史有正确、完整的评价,也不利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以指导我们以后的语言文字研究。

《新方言》无疑是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上进行语言的研究的,因此它继承了传统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中的精华部分,但也不免对其中的糟粕兼收并蓄。如因客观上语言文字具有继承性,且《说文》学在清代达到了高峰,因此《新方言》以《说文》研究为重点求本字、推语源具有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说文》是东汉时代的作品(公元100年),而汉语至少在甲骨文时期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书面符号系统,汉语的历史还要

比这早得多;况且汉语的继承性在各个时代都存在,近现代汉语言文字不可能都是上古汉语的遗留,因此从时代上来说,《说文》所收字能正确反映汉语语源、记载其本字的数量不会很多。从数量上看,《汉语大词典》收录的词目已多达 37 万多条,《汉语大字典》收录的单个汉字多达 56000 个左右,因此想在收字仅 9353 个的《说文》中都找到它们的本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新方言》运用《说文》学来求本字,既是它成功的原因,又是制约它取得更大成就之所在。从《新方言》这一具体例子中,我们可以知道,应该一分为二地对待传统小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更好地为现代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服务。

另一方面,《新方言》的写作时代是在清朝末年,其时民族危机深重,人们痛定思痛,反思国家积弱的原因,一部分人将汉语言文字的难学难用归为原因之一,以吴稚晖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废除汉语言文字而代之以“万国新语”,因此使汉语言文字及其研究蒙上不白之冤,汉字拉丁化运动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许多学术研究掀起了一股全盘西化的高潮。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凭着对本国历史、语言的热爱,以传统学术的整理研究为己任,顶住了这股全盘西化的浪潮。时过百年再回首,在汉语言文字的存废之争已基本尘埃落定时,在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为代表的汉语方言研究方法、《马氏文通》影响下的汉语语法研究逐渐显露出其弊端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和国外的学术研究相比,本国学术确实是有其弥足珍贵之处的,我们从来就不应该妄自菲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和外国语言学相比,以《新方言》为代表的传统语言文字研究有其不足之处和时代局限。和《新方言》差不多同时的西方传教士的汉语方言研究,特别是以高本汉为代表的欧洲方言学和中国传统方言研究有着不同的学术思路与规范。他们用本国成熟的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吸收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将语言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语言进行穷尽性、系统性地描写与分析,并用音标、实验仪器将语音的研究客观化、量化,给汉语方言研究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在其影响下,中国逐渐出现了现代汉语方言学。而以《新方言》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研究,错过了向外国语言学学习的机会,并因缺乏新的学术营养而逐渐枯萎,它开辟的文献语言学、汉语语源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成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主流。《新方言》为代表的传统语言文字学故步自封的倾向与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为代表的中西合璧的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带来的不同结果提醒我们:中国本土的语言文字研究和外国语言学研究不应该互相否定或取代对方,只有实现中西学术的联姻,方能产下健康的学术孪生儿。这正是本书研究《新方言》的动机与目的之一。

我们将在对《新方言》本身材料进行穷尽性分析的基础上,尽量利用现代语言学

的研究方法与成果来观照《新方言》。具体来说,本文将集中讨论如下几个专题:

1、《新方言》的词汇研究。我们将对《新方言》的今通语与今方言材料进行穷尽性的统计与分析,并与现代出版的方言研究成果对比,以见《新方言》在方言词汇的记录与研究方面的成就与不足(本书原稿末尾有 87 页的附录:“《新方言》今语词汇与《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及其他文献对照总表”,但本书出版时考虑篇幅有限而将此表和其他内容删除,读者需要相关资料可和作者联系,作者电子邮箱:sunbi59@sohu.com;此外,其主要数据统计及典型材料仍可见于本书。)考察《新方言》的词汇比较研究与词源考证,以见《新方言》对汉语词汇系统性特征的研究,以及它对汉语言文字一般发展规律的研究。

2.《新方言》的语音研究。我们将考察《新方言》的语音记录与分析的方法、术语与内容,以见《新方言》为代表的传统方言学在语音研究方面的优点、缺点。我们将考察《新方言》的共时语音研究与历史音韵比较,以见章氏对语音演变规律的研究,他的研究对现代语言学比较研究方法的启发,以及他在共时语音记录方面存在的缺点。

3.《新方言》的同词异字研究。我们将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与《新方言》的实际情况,对《新方言》的同词异字材料进行穷尽性统计与分析,在此基础上考察《新方言》同词异字研究背后的语言文字与语言文字学的内容,并从这个角度探讨《新方言》的方言词汇记录工作、对通用口语词的研究,以及对汉语言文字的规范整理工作。

4.《新方言》的求本字研究。我们将结合一些学者对《新方言》求本字的批评,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与材料来探讨《新方言》求本字的方法、成就与局限。

5.《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学史上的地位。我们拟将《新方言》与传统方言研究对比,以见《新方言》推进传统学术研究的内容以及它对后来传统方言学的影响;将《新方言》与现代方言学、海外汉语研究相比较,以见《新方言》在这两个角度观照下显现出来的不足,以及它对现代语言学的启发。我们还将对《新方言》进行简短的评价,并讨论从《新方言》的研究中,我们后来的语言文字研究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评价历史文献应该注意的方法与原则。